

新时期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雍 涛

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对毛泽东同志最好的纪念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把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本文拟从哲学方面谈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恢复、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中,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深刻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着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前进。

然而这条思想路线后来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林彪搞什么学语录、“走捷径”,割裂、肢解毛泽东思想,鼓吹“句句是真理”,不让人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鼓吹“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仍然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同志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破了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对这条思想路线作了完整的科学的概括,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①这条思想路线,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认识论思想。

一 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解决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是《实践论》的基本观点。但多年来被遗忘了,甚至被搞颠倒了。这个问题的重新提出,打中了林彪、“四人帮”那个反科学的思想体系的要害,推进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动了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

在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长期束缚下,有的人虽然原则上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一提到革命导师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言论也会有错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就认为这是“丢刀子”,是“砍旗”,是“非毛化”,犯了弥天大罪。这实际上涉及

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极大的革命勇气，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②什么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呢？他说：“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这是“形式主义的高举，假的高举”。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当前的实际出发，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才是“真正的高举”、最好的高举”^③。又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④这就是说，同对待任何理论、观点一样，我们也要根据实践标准来衡量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衡量他们提出的理论、观点，正确的就坚持，错误的就纠正，而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纠正的是它个别错误的论断，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推向前进。这些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在万马齐喑、迷信盛行的时候重新提出来，其巨大的解放作用，是只有亲身经历过个人崇拜和长期教条主义束缚、切身感受到那种思想僵化状态给党和人民遭到严重不幸的人们，才能深刻体会到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第一的观点。正是根据实践标准，我们党实事求是地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实际的理论观点、形势估计、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也以实践为标准，检查自己的工作，凡是实践证明做对了的就坚持下去，实践证明做错了的就坚决改正。实践标准这样深入人心，产生这样巨大的威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这么一个论点：共产主义是真理，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可见真理不一定都要经过实践检验，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党中央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怎么能说它还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呢？^⑤这就告诉我们，实践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检验是历史的、分阶段和逐步实现的。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说只有实践的最终结果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个体系，实践是个过程，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在过程中逐步进行和逐步完成的。我们过去的和现在的实践，都证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反映了客观历史规律的伟大真理。

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恢复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权威，破除了在实践观和真理观上的形而上学观点，进一步丰富了列宁关于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思想。

二 全面理解实践的内容和形式，阐明 知识分子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等著作中，曾经正确地阐述过实践的内容和形式，指出实践是人

们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但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的活动都应纳入实践的范畴。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却流行着一种狭隘的实践观。他们有时把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有时又仅仅归结为生产活动，而他们所理解的生产活动只是工人农民某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其他一切活动诸如科学实验、教学活动、文化艺术活动，企业管理、党政工作等等，一概被排斥在实践之外。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员都被斥之为脱离实践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把直接参与工业生产的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也都视为脱离实践的“精神贵族”。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脑力劳动是不是实践？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是否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在拨乱反正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要承认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劳动者。我国的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⑥胡耀邦同志也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知识分子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科学和工业的最新发展趋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将会逐渐缩小甚至归于消灭，将会造就出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在更高水平上结合的一代新人。但这是远景，今天还办不到。也就是说，科学文化知识和脑力劳动相对集中在知识分子这一部分人身上的状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存在。因此，知识分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绝对必需的智力因素，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⑦这些论述告诉我们：（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无论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还是从事其他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他们和工人、农民一样，也是社会的主人。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他们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2）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虽然是一种社会分工，但它们却是整个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两者实际上是互相渗透的，体力劳动离不开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伴随有体力劳动。用哲学的语言来说，社会实践是社会主体的一种整体性活动，它不仅仅是主体所进行的体力劳动过程，同时还包括主体的脑力劳动在内。因为不仅实践的目的、方案和计划的制定需要脑力劳动，而且主观目的向客观结果的转化过程以及对实践结果的评价也离不开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都是实践过程的必要环节。所以把社会实践仅仅归结为体力劳动，而把脑力劳动排斥在外的观点，是错误的。（3）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脑力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会越来越显得突出，脑力劳动者在全体劳动者中的比重也会逐渐增加，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将逐渐缩小以至消失。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社会实践的形式将发生变化，将会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新的实践形式。上述问题的解决，对于调动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大力发展科学文教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重要的意义。

三 正确理解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 纠正轻视科学文化知识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同志曾经阐明过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指出：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一个人要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既要勇于实践，又要认真读书，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

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逐渐离开了上述正确的原则，产生了过分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偏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不适当地强调边干边学而忽视正规教育，认为学校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大学似乎可以不办，把自力更生理解为一切自己从头做起，拒绝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极端。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用极大的努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一）强调认真读书的重要性。我们反对本本主义，但决不能反对认真读书。书籍既是人类过去文明的总结，又是人类文明今后发展的基础和阶梯。读书是个体获得间接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个体认识赶上前人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也是个体认识超越前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列宁早就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⑧要掌握全部人类知识，当然要读书，而且要读大量的书，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胡耀邦同志在对青年干部的一次谈话中说：“书本是前人积累的经验，不要轻视。我看，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真读书是不行的。也许至少要阅读两亿字的书。”^⑨

（二）强调要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溶合起来。一定的直接经验是个体认识发展的基础。但由于个人实践的狭隘性，也就决定了个人在这种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的狭隘性。因此，要使个人的智力得到充分发展，就必须把个人狭隘的实践和整个的人类实践结合起来，把个人的直接经验和丰富的人类经验结合起来。如果只有直接经验，而不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得大量的间接经验，那就不可避免地会目光短浅，孤陋寡闻，知识偏狭。特别是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了所谓“知识爆炸”的今天，间接经验在认识中的地位更加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继续以区区一己之直接经验藐视无比丰富的现代科学知识，岂不异于坐井观天？所以胡耀邦同志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要解放思想，不断地去接触和发现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自己的脑子有丰富多彩的具体的感性知识，同时要开动脑筋，努力掌握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使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成为比较系统的有条理的理論的认识，并且不断地把它们放在实践中去检验。这就要求我们下苦功，勤奋读书，向专家请教，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同时深入实际，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把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很好地溶合起来。”^⑩

（三）在培养和选拔干部的问题上，强调要转向正规教育和把有没有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放在第一位。新的形势新的任务愈来愈要求干部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完全通过边干边学来达到这样的水平已愈来愈困难，因而党中央强调对干部的培养，要把边干边学和正规教育结合起来，并且规定今后吸收脱产干部应当十分注意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識，严格按新时期的干部条件，主要从大中专毕业生或具有同等程度的青年中择优选拔，一般不直接从文化低的工人、农民中选拔脱产干部。胡耀邦同志在一次谈话中也明确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应当把现

代科学文化知识放在第一位，要重视科学，重视知识分子。过去挑选干部常常把有没有领导经验放在第一位，现在这种做法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今后挑选干部应当把有没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放在第一位。”^⑪这样就纠正了过去在用人问题上鄙薄知识，排斥知识分子的偏向。

（四）指出不能把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对立起来。互相学习、交流和引进，这是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特点。从认识论上说，这是符合人类认识的规律的。学习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就是打破地域界限，把别人的直接经验变为我们自己的知识。这种通过间接经验获得的知识，同样是可靠的。如果把别人的经验撇在一边，什么事情都要自己从头做起，拒绝学习和引进，这不是什么自力更生，而且愚蠢的爬行主义。“只重视亲身实践而贬低间接经验，否认它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样是违反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⑫

四 坚持两个飞跃的原理，阐明认识 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曾经阐明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并且指出后一个飞跃更加重要，意义更加伟大，但对如何实现后一个飞跃的问题没有专门加以论述。

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从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深刻发挥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两个飞跃的原理，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飞跃的问题，主要是强调要把不完全、不深刻的认识变为比较完全、比较深刻的认识。列宁曾经指出：“在认识论上和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识。”^⑬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注意不够，只是一般地研究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不太注意研究理性认识的层次，即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加深刻的本质的深化。十二大的文件提出和分析了这个问题。拿我们党对我国民主革命的认识来说，大革命失败以后，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作了原则上正确的规定，肯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出中国当时的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由于实践经验不够，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以及政策和策略的规定还很不完备，还有不少错误，因而六大以后，中国革命仍然走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直到抗日战争特别是七大时我们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才达到了完全的深刻的认识，从而制定了完整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把革命引向了胜利。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是这样。八大对当时的形势的分析和它所提出的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是正确的，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没有深刻的全面的认识，还没有一套具体的办法。因而八大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经

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十二大和八大不同，十二大继承了八大提出过的一些正确思想，并大大发展和丰富了这些思想，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比过去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因而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由此可见，认识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加深刻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反复实践，需要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需要辩证地思考和总结。

关于第二个飞跃，即理性认识如何回到实践中去的问题，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作了进一步发挥，阐明了实现这个飞跃的某些具体途径。

（一）要使原则的认识变为具体的认识。经过第一个飞跃得到的理论，它所反映的是客观实际中一般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实践所面临的客观实际却是具体而复杂的。因此，要把理论付诸实践，就必须使理论具体化，使原则的认识变为具体的认识，即把“是什么”变为“怎么做”。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程技术等门类或层次，可以看作是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中的过渡环节。社会科学理论的实现，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果不结合实际使原则的认识具体化，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解决总路线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具体贯彻执行的问题。十二大与八大不同，很重要一点就表现在这个方面。八大提出的路线是对头的，尽管还不明确，还不完备，但由于它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怎样贯彻执行，没有找出一套具体办法，因而后来实际上被否定了。十二大则不同，它不仅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且根据这个总任务，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对外政策、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具体地制定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十二大将把社会主义建设引向胜利。

（二）要使少数人发现的真理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人类认识史表明，认识和把握规律即发现真理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是较多的人，再后才是绝大多数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规律，在我们党内，是毛泽东同志和为数不多的老一辈革命家首先认识和把握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规律性的认识，是陈云等同志首先取得的。但当这些正确的认识还没有为党内多数同志所接受时，革命和建设仍然会遭受挫折，不可能取得胜利。由此引出一条认识论的道理：由少数人发现的真理，一定要通过宣传教育，使之成为多数人，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发挥改造世界的作用。

（三）选择最佳方案，进行典型试验。在把原则的认识变为具体的认识，制定行动方案的时候，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各种可能的方案，然后从中选择最佳的方案，而选择方案的标准应该是实际效益。毛泽东同志说过：“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⑭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但做得不自觉、不普遍。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注意选择最佳方案，讲究实际效益。赵紫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搞农业、搞水利同搞工业一样，也要进行决策论证，进行可行性研究，选择最佳方案，树立经济效益观点。^⑮方案确定之后，究竟可行不可行，还要经过试验。一切经过试验，本来是我们党传统的工作方法，但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丢掉了这个方法，因而吃了不少苦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这个方法，无论是拨乱反正，还是进行改革，都强调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以免来回折腾和发生混乱，这样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 科学地阐明自觉能动性的原理，解决 四化建设中如何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阐明过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强调要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同志离开了自己提出的正确理论，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犯了“左”的错误。后来林彪、“四人帮”则利用这种错误，鼓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粉碎“四人帮”以后，有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否认自觉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消极畏难，无所作为，产生了思想混乱。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科学地阐明了自觉能动性的原理，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倾向，解决了四化建设中如何发挥自觉能动性的问题。

（一）进一步明确自觉能动性的内容，说明自觉能动性和科学文化技术的关系。从全面的观点来看，自觉能动性不仅包括人的热情、意志、干劲，而且包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能力。在四化建设中掌握科学文化技术显得更加重要。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自觉能动性，“是百折不挠的志气，是艰苦奋斗的决心，是刻苦钻研的劲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按客观规律去干，它包括勤奋、智慧和科学。”^⑩“对人的因素，要作全面的理解，它不仅包括人的勇敢、觉悟和牺牲精神，还包括人的智慧和才能，包括人对科学文化技术的掌握和运用。”^⑪

（二）正确估计自觉能动性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党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指出：“精神和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在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中，批判‘精神万能’的错误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精神对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大体相同的物质条件下，由于人们精神面貌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结果。”^⑫文件还强调，我们既反对无视客观条件，制订超越实际可能的高指标，勉强去办那些经过努力还办不到的事情的“左”的倾向；也反对那种消极悲观，怨天尤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右的倾向。一定要把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鼓足干劲，知难而进，积极去办那些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推动建设事业的发展。这样就正确地估计了自觉能动性的作用，纠正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倾向。

（三）提出了衡量自觉能动性的客观尺度，说明了自觉能动性与实际效益的关系。自觉能动性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实际，是正确地发挥能动性；思想和行动脱离客观实际，是错误地发挥能动性。但究竟怎样才算符合实际，符合实际的程度用什么来衡量呢？赵紫阳同志在谈到经济问题时指出：“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使我国经济更好地持续发展。”^⑬这就给我们以深刻的哲学启示：经济工作要注意经济效益，同样地，其他一切工作也要注意实际效益。实际效益应是衡量自觉能动性的客观尺度，效益观应是人类发挥自觉能动性的一个根本观念。

（四）揭示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内部机制。这就是说，只有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为此，党中央提出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说，要提

高全社会、全民族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胡耀邦同志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用一句话说，就是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能力。”^{①⑤}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分辨能力，把握四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就是要坚定、鼓励和激发人们改造世界的信念、热情、毅力和斗志，提高人的政治素质；而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群众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则是为了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这些论述和措施，为我们找到了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内部机制，为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精神指明了途径，开辟了道路。

以上五个方面，都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认识论思想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②③④⑥⑫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注释：

- ①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81、30页。
- ②③④⑥⑫⑭ 《邓小平文选》第35—36、121—123、157—158、86、88、64页。
- ⑦ 《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红旗》1983年第6期。
- ⑧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8页。
- ⑨ 《光明日报》1982年8月19日。
- ⑩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1年7月1日。
- ⑪ 1983年1月5日参观中国科学院科研成果展览会时的谈话。
- ⑬ 《列宁选集》第2卷，第100页。
- ⑭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473页。
- ⑮ 《光明日报》1983年6月2日。
- ⑯ 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前程与实干精神》，《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 ⑰ 杨尚昆：《建设强大的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红旗》1982年第15期。
- ⑱ 《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 ⑲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单行本，第16页。
- ⑳ 《红旗》1983年第1期。